

细探民营企业的“苦水”

九部长奉命督查走访逾 700 家企业发现四问题

民间投资增速不断下滑,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民营企业到底是受政策制约投不了、没法投,还是因环境影响不敢投、不愿投? 国务院派出 9 个专项督查组,在未提前通知地方的情况下,近日到江西、黑龙江、广东、湖南等 18 个省市区进行了 10 天的督查。

这可不是一般的工作检查。督查小组都是由什么人组成的? 9 位带队组长包括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环保部、住建部、水利部等九大部委副部长,级别最高的为正部长级。组员则由不同部门的同志交叉组成,以厅局级领导为主。

据悉,截至目前,督查组已走访、座谈企业超过 700 家。为了更真实地了解情况,有的督查组在实地督查中采取随机挑选企业的方式,或则临时更换企业名单,座谈全程不允许地方领导干部参加。

重点来了,督查组到底了解到哪些问题? 民营企业主要倒了哪些“苦水”? 一路跟随督查的记者提前“剧透”,主要发现四大类问题。

问题一:屡遭“白眼”频“碰壁”,公平待遇未落地

“现在民间投资面临的最大困惑就是缺乏公平待遇。”重庆一家环保企业负责人向督查组坦言,虽说市场需求不足也是重要因素,但并非所有行业不挣钱,比如不少医药、文化、环保企业效益都不错,在国家政策引导下也想扩大投资,但屡遭“碰壁”,影响了投资动力。

《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和其他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实施同等待遇。然而督查组发现,一些地方和金融机构并未做到“一碗水端平”,在规模上“重大轻小”,在身份上“重公轻私”,在地域上“先内后外”。

四川远舰建设集团董事长杨远见颇有感触地说:“现在很多 PPP 项目很少有民企参与的份儿,有的地方直接告知‘优先考虑国企’。一方面是因为国企能从银行贷到更低成本的资金,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也想避免引发道德风险质疑。我们申请过很多 PPP 项目,都被以各种理由拒绝了。”

在河北,一家民营焦化企业负责人反映



了同样的疑惑:“国务院明文要求,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合理降低国有控股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比例。但地方在化解‘僵尸企业’时,却只愿意卖给国企。”

英利国际置业副总经理杨晓榆在督查组座谈时直言,民营企业贡献了 80%以上新增就业,但最近两三年民企不仅排在国企后面,连外企地位都比不上。不能因为“出身”不一样,参与市场竞争的难度和结果就不一样。

问题二:抽贷、断贷现象突出,融资难仍普遍存在

督查中,不少民营企业企业家反映,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银行对民企的贷款收缩过大,企业贷款难、融资成本高、贷款期限短的现象普遍存在。

东部一家民营企业负责人向督查组反映,企业投资一个项目需融资 2 亿元,多方申请贷款无果,最后仅贷到 500 万元,年息 10.4%,还要把 30%的贷款资金返存在银行。银行频繁抽贷让小微企业“举步维艰”。河北石家庄东方丽人家用纺织品公司于 2011 年从做出口贴牌转向做国内自主品牌。然而,银行由于认为企业有风险,连年多次抽贷 1000 万,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企业总经理岳丽丽谈起这一经历一度落泪。

“民营企业信誉再好,最高也只能被评

为 AA+,而国有企业一般都能评上 AAA,这相当于给民营企业融资人为制造了瓶颈。”辽宁一家民营企业老总表示,希望能够以市场竞争力为标准,一视同仁地对待行业内的多种所有制企业。

福建省金融办主任付朝阳认为,融资难与许多银行只关注于部分民企违约造成贷款风险,而很少考虑区域差异性和企业个性化贷款需求有很大关系。形象地说就是“一人感冒,全家吃药”。这当中,存在着大量地区和行业“一刀切”的现象。

问题三:“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审批繁琐依然突出

从实地督查的情况看,企业对这两年政府服务态度转变普遍予以好评,不过对政府办事效率仍有不少“吐槽”,认为是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变成了“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一些基层干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支持民间投资缺乏积极性。

“这两年政府简政放权,看得见的审批确实少了,但看不见的门槛又多了起来。”重庆会凌电子新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晓东与国务院督查组座谈时反映,“我们作为比较成熟的中型企业一年各种第三方认证审核直接成本至少要二、三十万,加上人力成本、各种材料成本就更高了。”

青海一企业负责人深有感触地说:“气

象等相关部门对光伏电站避雷针每年要进行一次检测,检测费高达 8 万元,而且只能由指定机构来检测。水电气等市政公共服务部门收费高,如天然气接口费高达 110 多万元,自来水接口费 9 万元、试压费 11 万元,市场价为 2000 元的水表收费 12 万元,而且没有统一标准。”

尽管这两年政府加大简政放权力度,但督查组发现,“建一栋楼盖一百多个章,批一块地得跑两年”的现象依然较为突出。山西一家民营企业负责人说,仅办理施工许可证就需提供 52 项资料和证件,办分项证件还要履行十余项手续,“等手续办好,商机早失了。”

“我们公司开发了一款降血糖的藏药,研制花了六年,审批已经五年半了,相关部门迟迟拿不出来审批结果,每次打电话催促,得到的答案总是‘我们人手太紧’。”青海央宗药业法人代表徐楠向督查组反映,“再这么拖下去,项目肯定要黄了。”

问题四:成本高、负担重,影响企业投资意愿

督查中,不少民营企业普遍反映经营成本增长过快,如用工成本不断增加,土地价格持续上涨,电费长期居高不下,影响投资意愿。

“最近几年,煤炭价格大幅下降,但电价下降微乎其微,这无形中增加了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新疆一位民营企业负责人说。

除要素价格高,知识产权保护缺失也让民企在市场竞争中失去一层保护膜。

成都星空三维公司负责人余晟睿向督查组坦言,自己公司发明的 3D 打印产品,才上市一个月,就出现了非常相似的仿制品。相比之下,公司专利审批却需要很长时间,从去年 10 月开始到现在还没批下来。“面对市场上的这些假冒产品,我们也无可奈何,非常苦恼。”

反映最为普遍的是人力成本不断增加。“平均算下来,社保缴纳占到了工资总额的 32%左右。”五洲传媒副董事长徐登权说,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企业利润普遍下滑,政府应该进一步降税减费,让利企业和百姓,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

(新华社记者:姜琳、于佳欣、朱基钗、华晖迪、董小红、庞书伟、李超、陈春园、王自宸)

数据显示,中药饮片 2006 以来连续 9 年的年复合增长率是 29.7%,位于所有子行业之首,而医药制造业全行业是 21%。如果从销售规模比重来看,2015 年与 2006 年相比,中药饮片占医药制造业全行业比重也有 2.5 个点的提升。

而就在河北大爆亳州中药饮片不合格问题的前两日,亳州当地食药监局刚启动中药饮片专项检查,这其中“是否为合法中药饮片生产企业设立,是否存在出租出借许可证照行为”被要求重点严查,“是否持有并悬挂营业执照,是否存在经营假劣药品药材行为”也被要求严查。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马建忠)

也谈制造企业的“品质革命”

南京财经大学管理与工程学院 刘越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各种各样的商品都被贴上“Made in China”的标签,“中国制造”的形象也由此深入人心。然而,“中国制造”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信誉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有的甚至让人留下“量多质差”印象。越来越多的国民选择进口的奶粉、刀具甚至是马桶,而中国每年大批的玩具、鞋子、服装类的工厂面临停产和倒闭的威胁。这些残酷的现实都在给中国的制造企业敲响警钟。

5 月 11 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促进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更好满足群众消费升级需求,一场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品质革命”呼之欲出,而“品质革命”的实现,则需要一家家企业以工匠精神专注于产品,推动产品服务全面升级。

制造企业的“品质革命”需要提升质量意识。质量是企业生命线。由于贫穷落后、物质匮乏的历史原因,以往我们追求尽可能多的产品满足低收入的消费者,无暇顾及产品的品质。传统的大批量的生产方式被认为是提高了生产效率,然而长期的生产过程中暴露出很多的问题。面对消费需求日益提高的现状,“中国制造”想要摆脱“量多质差”的状况,必须由注重量向注重质的转变,培育和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引导企业树立质量为先、信誉至上的经营理念,由中国制造向精品制造转变。

制造企业的“品质革命”需要提升人才队伍质量。人是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既要重视研发的人才、企业的管理与经营的高级人才的引进与培养,而且要重视第一线直接参加、直接影响到产品质量和产品水平的高技能人才培养。高技能人才队伍是高品质的基本保证,研发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应该并驾齐驱。工业企业要将人才战略列入企业的长期战略规划中,花大力气培养一批具有工匠精神的人才队伍。

制造企业的“品质革命”需要推进科技创新。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仅仅是视觉上勉强合格的低端制造已经远远地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所期待的是高颜值、优品质、多功能的商品。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制造企业必须以技术创新为依托,大力发展本企业的核心技术。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发展属于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品牌。

制造企业的“品质革命”需要落实精益管理。日本的丰田通过精益思想的引导,由大批量的生产方式转变为精益生产方式,减少了生产环节中的浪费,成为行业的标杆。“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要求企业必须把精益思想引入各个部门,重新定义产品的价值,去除价值流中的浪费,从顾客的角度出发拉动产品的价值,树立永远追求尽善尽美的观念。

制造企业的“品质革命”需要优秀企业文化。企业文化作为一个企业的灵魂所在,也是企业转型中的重要部分。使追求高品质成为企业所有员工的价值取向、努力目标,激励企业员工自觉发挥潜力高效地为企业工作,提升在消费者心中的品牌效应。将企业文化融入产品的设计中,通过本企业的产品传递给消费者,提升商品的内涵价值,满足顾客对产品的多元化诉求。

制造企业的“品质革命”需要发挥政府部门监督作用。企业能够在健康良好的市场环境中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监管。假冒伪劣、质量不佳的消费品曾让“中国制造”蒙羞,更影响消费者的体验和健康。政府监管部门既要加大企业产品质量监管力度,同时又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严打假冒伪劣,防止“劣币”驱逐“良币”。

(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孙韶华 王璐)

中药饮片多批检测不合格

行业或迎洗牌

近日,河北、四川等地分别发布药品质量公告,共有 40 多批次药品被查不合格。其中,河北的药品质量公告,21 批次不合格药品中,14 批次为中药饮片。与此同时,对中药材和中药饮片专业市场的专项检查也在推进,亳州市食药监局官网显示,该局已在集中开展亳州市中药材专业市场中药饮片专项检查。

大牌饮片厂“被卷入”不合格批次

河北省食药监局发布《河北省药品质量公告(2016 年药品监督抽验第 1 期)》,公告显示,河北省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药品检

验机构对全省药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的药品质量进行了抽查检验。在 2016 年第一季度药品监督抽验中,不符合标准规定药品(不包括中药材品种)共有 24 批次。这其中,乌梢蛇、地龙、炒酸枣仁、党参片、僵蚕、五加皮、半夏、红参等 13 个批次的中药饮片被爆“性状”不合格,另有 1 批次白芍则被爆“含量测定”不合格。上述不合格中药饮片总计涉及 9 家“标示生产企业”。

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周超凡告诉记者,“性状”不合格,主要是状态和功能发生了变化。部分中药饮片为了防止发霉往往会用硫磺熏蒸,但依照国家药典的标准,有的中药饮片是不允许硫磺熏蒸的。

记者还注意到,标示由亳州中药饮片厂生产的 5 批次不合格产品,标示由北京同仁堂亳州) 饮片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2 批次不合格产品、及亳州市贡药饮片厂 1 款不合格产品,均备注了“未生产过”。

中药饮片行业整顿有待加强

一直以来,中药饮片行业都是医药子行业中销售规模最小的行业,同时也是净利润率最低的行业。

近年来,随着年复合增长率和销售规模比重的快速增长,行业如何进一步加强监管已是迫在眉睫。

同时污染物排放量高于规定的排放总量指标的,按照当地适用税额标准的 3 倍计征。

根据《意见稿》,环保税的重点监控(排污)纳税人,是指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建材、采矿、化工、石化、制药、轻工(酿造、造纸、发酵、制糖、植物油加工)、纺织、制革等重点污染行业的纳税人及其他排污行业的重点监控企业。这意味着,一旦环保税征收,上述行业将受到更显著的影响。

同时,过去由环保部门“自收自管”的排污费征管模式,也将改为“企业申报、税务征收、环保协同、信息共享”的环境税征管模式。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蒋震对记者表示,环境税是非常专业的税种,单单依靠税务机关无法实现充分征管,例如如何测算应纳税污染物的计税依据本身就是非常专业的领域,征收环节应该充分考虑这一点。此外,《意见稿》中,税率充分考虑了污染物的种类,采取定额税率方式,避免对企业造成过大的负担,而且在环境税制设计中,可以根据经济运行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形势来进行调整,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使得环境税更容易被各方接受。

记者还了解到,环保税很有可能会设计成中央地方分享税,税收大头有望留给地方。

环保税箭在弦上年内有望出台

税率或再适度提高

环保税开征的脚步越来越近。记者获悉,国务院环保税法调研组日前已经就相关情况在南京展开调研。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 2016 年立法工作计划,《环境保护税法》将在本月进行审议,如果进程顺利,环保税法有望年内出台,这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领域“费改税”将以立法形式确认固化,税率有可能根据经济形势再适度调高,税收大头有望留给地方。近年来,迫于严峻的环境形势,环境治理正从单一的行政手段向多元化手段并用看齐。早在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直到 2015 年 6 月 10 日,国务院法制办终于公布了由财政部、税务总局、环保部联合起草的《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之后今年初财政部和相关部门进一步修改后再度报送国务院。

“推动环境费改税势在必行。”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表示,我国环境保护收费从 1979 年开始,已有 35 年历史。尽管征收使用管理逐步规范,但还是遇到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环境保护政策目标的落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收费自身的局限性所致,仅通过完善收费管理制度无法克服。相比

弹性大、容易钻空子的收费,征税无疑更具有强制性,调节力度也更强。

除了费改税,适当提高税率也是改革的重点。根据《意见稿》,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每污染当量的税额分别为 1.2 元和 1.4 元,固体废物每吨税额从 5 元到 30 元不等。

对此,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苏明指出,现在经济形势下,企业还是非常困难,如果完全按照环境的治理水平来安排税率,企业难以承受。“比如说,如果按照治理需求,每当量二氧化硫(属于大气污染物)需要收税至少 3 块钱,但企业感觉负担太重。”他表示,“根据形势发展,不排除继续提高的可能”。

因此,虽然《意见稿》规定的税额标准与现行排污费的征收标准基本一致,但各地调控空间大,而且对排放超标的行为惩戒力度加大。省级人民政府可以统筹考虑本地区环境承载能力、污染排放现状和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目标要求,在规定的税额标准上适当上浮应税污染物的适用税额,并报国务院备案。而且,污染物排放浓度值高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排放量高于规定的排放总量指标的,按照当地适用税额标准的 2 倍计征;污染物排放浓度值高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专家指出,按照财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原则,环境税税收留给地方是合理的。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担心,一些地方可能会将其作为招商引资的一种手段,通过税收优惠来实现招商引资,这可能会影响环境税的实施效果。

在蒋震看来,环境税立法除了一些税制要素之外,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对环境税的功能定位,这是决定税制要素设计和征管模式的基础和前提。《意见稿》明确提到“为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社会节能减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税制设计和征管都要围绕这个功能

定位来实现。所以说,环保税法的主要功能是保护生态环境,其次是通过筹集收入来发挥市场公平作用,保护、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使用先进生产技术,减少“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即污染排放大的反而成本更低、反而更有市场)。

此外,环境税改革和其他税种改革要协同,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稳定税负”要求。